



##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 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至2022年10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为开篇，其他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

《习近平著作选读》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不断夺取新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立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建设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和担当，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英文版自今年3月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版的对外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系统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对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 编辑要为作家的创作保驾护航

——名刊名社扎实有效推进“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之二）

□本报记者 王 冕 刘鹏波

在扎实推进“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过程中，编辑的角色尤为关键，他们不仅需要具备深刻理解、把握时代精神和深厚的文学素养，更要有与作者紧密合作、共同成长的耐心与智慧。那么，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编辑应该如何介入作家的创作，为作品的完成保驾护航？本报记者采访了参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名刊名社相关负责人。

### 好作品的出版是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

“确定选题是一个难关，选好题后再去匹配合适的作者，也非常考验出版者的基本功。”谈到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大国村志》，《啄木鸟》主编杨桂峰表示，当初确定这个选题出于两点考虑：“一是由于公安部重点扶持的对口省份是贵州，在决战脱贫攻坚阶段我们曾策划过由公安作者创作的作品，发现有一定局限，这次决定在全社会寻找作者，最终找到了作家韩生学；二是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山乡治理一脉相承，再加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乡村振兴五大抓手，于是选择从基层政权建设这个角度切入选题。”

今年3月，《大国村志》初稿完成约有10万字，《啄木鸟》编辑部对其进行了大量删减，使之变为一部6万字的中篇，发表在《啄木鸟》第5期上。同时，“我们也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题目作了修改，叫作《远乡》”，杨桂峰透露，书名原先取为《大国村志》，是因为《啄木鸟》此前曾发表过一部探讨人口安全问题的作品《大国养老》，两者都是聚焦社会相关问题，故而取了类似的名字。“我们和作者反复沟通，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合作状态。目前作者正在扩写，准备完成一部六七万字的作品，并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聚焦新时代东北乡村全面振兴的老藤的长篇小说《草木志》同样经历了改名这一环节。该书原名为《依依墟里烟》，老藤曾在小说创作的背景地小兴安岭一带生活，对东北的植物如数家珍，当地很多植物在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也曾反复出现。老藤斟酌再三后，提出把当时正在修改中的《依依墟里烟》改名为《草木志》，经过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商量，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拿到初稿后，百花社深知后面的编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立即从《小说月报》编辑部、设计部等相关科室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草木志》项目组，作家出版社也派出资深编辑进行联合审校。”《小说月报》编辑室副主任齐红霞

告诉记者，在《草木志》的创作过程中，不仅作家社和百花社领导、编辑与作者反复沟通，提出修改意见，而且为了使作品更加完善，两家出版社还联合举办《草木志》改稿会，“老藤整合专家在改稿会上提出的修改意见，对作品部分情节作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赋予作品更加宽阔的叙事与表达空间，最终交出了一部令人满意的书稿”。

### 作品不能只注重长度，要精炼有力

通过编辑与作者的反复沟通，让作品精益求精，是有人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品的必由之路。

百花文艺出版社是2023年2月加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名刊名社拓展计划的，其出版的作家李伯勇的《别人的太阳》入选了该计划。李伯勇初稿写了60万字，编辑和专家在审稿后共同给出的意见是需要再打磨。于是，作者将书稿缩减为40万字，并针对专家提出的叙事线简单和语言呈现单一化等问题，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打磨。

写得长似乎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普遍状况。但长就意味着厚重、意味着好吗？对此，《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徐则臣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审稿和阅读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当下文学作品的篇幅越来越长。在他看来，小说并非写得越长就越好，而是应当精炼有力。“现在的小说越写越长，似乎30万字以下的长篇都不太多了。作家往往舍不得删减，很多作品都是‘细节肥大症’。”徐则臣以法国作家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时将手稿从1800页删到500页为例，鼓励作家们对自己的作品“下手狠一点”，“我读到的作品，如果都能删去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篇幅，它们的质量肯定会进一步提高，变成一部部骨骼清奇、读来舒朗的作品”。

“改稿的第一步，就是删。”徐则臣建议编辑们在与作者沟通时，既要鼓励作者放开手脚创作，也要表达删减的必要性。对于作品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编辑则可以在后期协助作家处理。“一部作品中哪些内容是无效的，哪些是半有效的，作者其实心里都知道，只是觉得辛辛苦苦写出来，再删掉会舍不得。只要给作者一个字数要求，他们很清楚哪些部分可以删。”

### 通过培训，持续提升编辑能力

“一部好的作品离不开编辑的深度介入。”作为一名资深编辑，安徽文艺出版社总编办主任韩露表示，在整个

出版过程中，编辑要对作家的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审读和修改，确保作品在语言表达、逻辑结构、故事情节等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准，还要对作品进行适时的调整和优化，并注重与作者的沟通交流，与作家共同打磨精品力作。

《钟山》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李祥通过亲身体验谈到，编辑需要启迪作家深入探索写作素材，发挥个人创作优势，创新叙事手法，在选题策划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建议从创作之初就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与作家共同探讨创作选题，帮助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调整框架、理顺逻辑、打磨细节，增强作品的主旨表达与审美品质。同时，编辑要与作者紧密协作，成为作者的顾问，深化同作者的沟通与合作，助力文字的雕琢。情节的去芜存精，确保作品精准传达作者的深层意涵与美学追求。

此外，编辑还可亲历作者创作现场，体验生活实感，加深对作品创作背景的理解，为作品的完善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新时代对文学期刊提出了更多挑战和要求，对文学期刊编辑也有更高的要求。文学编辑不仅是文字的守望者，更是文化创新与传承的践行者，期刊和编辑要在加强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深度连接的过程中发挥更多作用。”李祥表示。

不少受访者都认为，编辑在作品推进环节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在改稿会上的主导作用。各领域专家提出的意见如果能归结到编辑，从编辑的角度进行筛选，进一步消化提升，并将其转化为可行性修改方案，和作者去讨论，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改稿方式。但也不是所有作家都适合集体改稿会的形式，对有些作者而言，编辑与作者之间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可能更有效率。

由于编辑的能力水平可能对成书质量造成影响，杨桂峰认为，有必要对骨干编辑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和对作品的理解能力。考虑到当下年轻编辑队伍的实际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尽管他们学术基础扎实，但可能缺乏对农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直接体验，特别是那些直接从校园步入编辑岗位或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编辑，对中国当前的农村社会现实可能不够熟悉。因此，培训不仅可以增强他们对农村题材作品的审稿能力，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与作者沟通，从而提升作品的整体质量。



## 为当代文学作历史注脚

洪子诚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6月8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高等学校文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南方文坛》杂志社共同主办的“洪子诚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谢冕、洪子诚、陈平原、黄子平等学者，贺桂梅、张清华、曾攀等主办方代表，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高校的50余位学者参会。与会者围绕洪子诚学术著作所涉及的多种当代文学研究重要议题进行了交流对话。

“洪子诚在号称‘没有学问’的地方，做出了大学问。这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谢冕认为，洪子诚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精神做“有为”之事，在历史的夹缝中发现了文学的诗意、美学和精神。“一些当事人都经历过的历史，现在讲起来都恍如隔世。洪子诚把这些写成了一部辉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本书注释很详尽，到现在还是我的案头参考书。希望后来的年轻学者，好好读洪老师这本书，像他一样做学问。”

曹文轩谈到，洪子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材料具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性，“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司空见惯、貌不惊人的材料背后隐藏的历史心机与时代记忆”。在当下，中国学术、中国理论更值得走出去，“我们是学术理论的接收者，同时也是学术理论的输出者。我们不只是向世界贡献学术，我们还要向世界贡献思想。这方面洪老师为当代文学做出了榜样”。

在陈平原看来，洪子诚是一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史家。他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都属于广义的史学范畴，但他同时带有文学的趣味和眼光，其中包含作家作品文学性的叙述，迂回审慎的思想风格，以及不断地在自我反省中保持论述的弹性和张力。

戴锦华认为，洪子诚的研究为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范式，使得后来者能够去捕捉、提炼20世纪中国历史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我心中，洪老师是作为一个仁望、阅读与沉思的学人存在的。他和时代的某种错位，形成了他把握这个时代的独特角度、力度和财富。”陈晓明谈到，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刻画了一个当代文学的地形学地图。他以自己的观念、方法，在当代文学处于“一片茫茫荒野”之时，勘探出一个个标识，列出许多问题与方法的要点。

研讨会中，王中忱、程光炜、孟繁华、王光明、陶东风、吴思敬、蔡翔、吴俊、张均、罗岗、毛尖等与会学者围绕当代文学的起源与分期、当代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当代文学学科规范与方法、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海外传播、当代文学高校教材建设等话题进行了交流探讨。与会者从洪子诚所提出的文学史研究范式出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种“注释历史的工作”是借由注释来呈现历史的多面性与流动状态，在“历史化”过程中打捞所不被瞩目的话语、文本、事件，对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作为整体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某种典范意义。尤其在其专著中所涉及的大量当代文学学科及学术问题，值得后辈学人“学着做、跟着做、接着做”。

据了解，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自2002年出版后，历经多次再版，该书第四版在2024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精装再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等著作也有包括英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在内的13个语种签约授权输出，其中7种已经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学术成果走向海外。

（康春华）

## 第五届茅盾新人奖在浙江桐乡颁发

本报讯 5月27日，由中华文学基金会、浙江省作协和桐乡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茅盾新人奖颁奖典礼在浙江桐乡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一氓，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徐贵祥，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出席并致辞。

第五届茅盾新人奖经过评奖委员会认真评审讨论，于今年1月选出茅盾新人奖获奖者和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获奖者各10位，分别是从治辰、胡竹峰、周荣池（黑水）、南飞雁、熊焱、陈宏伟、王晴飞、李燕燕（燕子）、杨艾琳（杨知寒）、陈崇正，和王小磊（骷髅精英）、史鑫阳（沐清雨）、何健（天瑞说符）、陈彬（跳舞）、高俊夫（远瞳）、黄卫（柳下挥）、蒋晓平（我本纯洁）、刘金龙（胡说·终南左柳）、黄雄（妖夜）、胡毅萍（古兰月）。

李一氓谈到，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茅盾先生以宏大的文学视野，响应时代的呼唤，以优秀的文学创造回答了新文学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等重大问题。为时代赋形，为人民立传，是文学先辈跨越时代的精神召唤，也是新时代赋予作家的时代责任。从2014年创办至今，该奖对于发现文学新人、推举青年英才、支持激励青年作家更好更快成长，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期待青年作家能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展现新时代新气象的精品力作，用文学的方式为这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为中国文学史留下独特印记和传世记忆。

颁奖结束后，举行了文学对话和作品分享会，陈涛、马季分别主持活动。从治辰、杨知寒、陈崇正、刘金龙、史鑫阳、何健、黄卫、胡毅萍等获奖作家畅谈创作感悟，引发现场读者的热烈反响。



六月十四日，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开幕，十四部中外故事片角逐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爵奖。图为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典礼上表演。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